

山西文史資料

第四輯

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文史資料

第四輯

(內部發行)

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太原

山西文史資料

第四輯

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內部發行)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號)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二號

山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太原印刷廠印刷

*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 6 $\frac{9}{16}$ 印張 · 138,000字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數：1—5,150冊

統一書號：11088·18

定 價：0.67 元

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和

- 大同地区煤矿企业…………… 侯德旺
王思賢 (167)
- 新霍女界同盟会宣言…………… 竹 园 藏稿 (185)
- 南桂馨、荣福桐兩先生談
- 山西国民代表劝袁世凱登基…………… 王尊光
郑元麻 笔录 (187)
- 旧报重輯…………… 王尊光抄录 (189)

閻錫山勾結日寇的罪惡活動

趙 瑞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先後達三十餘年之久。通敵叛國是他一生反革命活動中最嚴重的罪惡活動之一。本文打算就閻錫山和日寇的勾結作一比較系統的敘述，重點是從1937年抗戰開始至日寇宣布投降以後。為了幫助讀者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本文開頭對抗戰以前的閻日關係，作了簡略介紹。但由於筆者知道的和收集的材料不多，挂一漏萬，還不能說是他這一罪惡活動的全貌，希望親身經歷和知道內情的讀者予以補充校正。

遠在1904—09年閻錫山留學日本時期，即和臭名遠揚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岡村寧次（時為他的隊長）、板垣征四郎（時為他的教官）、土肥原賢二（他的同學）等交結，極力逢迎巴結，尤其和土肥原過從甚密。

1917年，閻錫山仰承北洋軍閥段祺瑞的鼻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護法北伐”，通過段的中央陸軍部，與日本駐北京的大倉洋行接洽，購買了一批軍火，從而和這個實際上是日本駐華軍人俱樂部的日本特務機關發生關係，他常派親信官員梁上椿、南桂馨、蘇體仁等，和這個日本特務機關——大倉洋行經

理、日本浪人林龟喜不断往来，通过林龟喜，和日本軍閥进行勾結。

在1919年到1920年期間，日本在津駐屯軍司令官鈴木高橋，接受閻錫山邀請，兩度到山西与閻会晤，表面上說什么“參觀山西的政治”，实际上是和閻錫山建立所謂“日閻亲善友好关系”。同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也先后来山西，和閻大講“亲善”。閻待以上宾之礼。在此期間，土肥原借“旅行”之名，有计划地对山西的軍事地理，作了詳細的偵察。他曾亲身跋涉名隘要塞之中，雁門天險，桑干河名川，都是他盜劫軍事資料的重点。

1926年，南桂馨以閻錫山駐張作霖处代表之便，和在华北作陰謀活动的日寇进行勾結。又和苏体仁(时为閻的日文秘书)經常与日本駐屯軍參謀长山村等人秘密往来。1928年閻錫山参加国民党“北伐”时期，即令南桂馨在天津加紧和日寇勾結。当时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新井，和參謀三野，曾向閻担保：“只要山西軍能够占領保定，日軍就可保証不用山西軍打一枪而取得京津”。后来，閻錫山果然倚仗日寇，于同年6月8日进入北平。

1930年，閻馮“倒蔣”失敗，閻錫山被迫下野，逃居大連，住黑石礁的一所大棧內。他派靳祥垣、宋彻、李庆芳、张愷等秘密和日本关东軍联系，并經常到关东軍情报室，交換中国內部情报。他常和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賢二晤面，指派李庆芳为联系人。經他們多次商討，訂立了密約三条：

- ① 閻錫山贊助日本关东軍占領中国东北全部；
- ② 日本关东軍支持閻錫山将来担任华北首領；

③ 日本关东軍部將設法護送閻錫山返回山西，籌備一切。

1931年8月5日，日寇派飛機將閻錫山護送到大同，住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家裏。他們談到張學良時，趙有所顧忌，閻得意地說：“張學良將自顧不暇，那里還能再管我們的事！”當他回到河邊，與他的參謀長朱綬光談到時局問題時，又說：“……華北縱然被日本打進來，山西境內也不會發生什麼戰事。”

經過“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而閻錫山卻派了邱仰濬、靳祥垣等同往日本，借考查村政的名義，秘密與板垣征四郎會晤，一方面對關東軍護送他由大連返回山西重新執政，致以感謝之意，另一方面懇求日寇繼續給予支持。當時板垣對邱、靳二人說：“只要閻錫山不作一切抗日準備，永遠和日本親善友好，日本今後仍然對他盡力支持，給予應有的幫助……”。因而，閻錫山閉口不談抗日救國問題，而大叫什麼“防共圖存”、“親日亦未嘗無益”……同時提出什麼“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與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大唱雙簧。

1936年1月12日，日寇特務頭子土肥原和天津駐屯軍參謀中井飛太原，策動閻錫山加入“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時，日寇在華北各大中心城市遍設特務機關，閻錫山適應日寇的要求，贊助日寇在太原、綏遠、大同等地，公開設立特務機關，在太原負責的為白井、綏遠為羽山，大同為鈴木重樓。他們專門搜集晉綬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報，並搜尋各县县志，盜竊古代文物，公開走私，制賣毒品，開設賭場，散布謠言，破壞社會秩序，到處橫行霸道，無所不為。而閻錫

山却囑咐他的軍政官吏好好应付，“不得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閻錫山派他的參謀长朱綬光专負勾結日寇的总責；还在天津設有秘密电台，与日寇連系。

从这一段簡略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抗战时期閻錫山勾結日寇，随时准备公开投敌，不但是他的反动本質所决定的必然趋势，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源渊，是早有准备的。

下面我們就来叙述1937年抗战开始至日寇投降以后，閻錫山勾結日寇的罪恶活动。

派遣文武官員投敵，準備后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下，閻錫山被迫卷入抗战洪流，骨子里却时时刻刻准备妥协投降。还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他的高级干部說：“我們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汪精卫叛国后，高唱“和平”謬論，閻錫山即加以响应，他說：“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他并且說：“天要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他估計蔣介石要投降，他要走在蔣介石前面）。及至1939年3月25日—4月22日的“秋林會議”上，他更集阴谋投降妥协之大成，企图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的道路，有计划地制造了內部磨擦，开辟妥协投降方便之門；提出了“无条件存在”謬論和“狡兔三窟”政策；提出“建立小国家”，強調“民族复兴”而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以适应日寇对中国“分而治之”、“以华治华”的狂妄野心。在組織上，成立了什么“精神建設委員會”、“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

团”等等，并指使这些特务团体，派遣大批“蛇蝎虫豸”（閻錫山派遣破坏分子到晋东南时訓話中語）散布謠言，瓦解新軍，打击牺盟会，解散动委会，对八路軍也肆意攻击、侮蔑。在軍事上，提出“訓練重于作战”口号，設立“晋绥軍軍官集训团”，传授什么“民族革命战法”，要“保存实力，避免牺牲。”

在这一个时期，他秘密派遣他的文武官員公开投降日寇，为他自己准备后路。太原淪陷后，山西第一任伪省长苏体仁，是閻錫山預先在天津安排好的一个班子。在苏体仁粉墨登場以后，閻錫山口口声声称道什么“苏先生”，他說：“苏先生早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十里。”又指使他的“高干”們对在秋林受訓的人員說：“苏先生不是当汉奸，如果是汉奸，人还給我們維持晋钞嗎。”王靖国部十九軍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在晋西柳林鎮公开投敌，被日寇擢为“兴亚黄軍司令”，閻不下令申討，反而通令不准說蔡是汉奸，并且經常派人和蔡雄飞联系。并暗使他的軍隊和日寇、伪軍接洽，消除敌对情緒，建立所謂“亲善友好”关系。如暫編第一旅旅长崔道修与敌人秘密来往，副旅长李龙标，常到赵城城內与敌人联欢，敌人給予大批的伪“联合准备銀行”鈔票，崔部士兵都使用的是这种竹鈔。

哄傳一時的臨汾和平談判

1939年11月1日，閻錫山以十九軍軍长兼十三集团軍总司令王靖国、六十一軍軍长兼六集团軍总司令陈长捷的名义，派

代表与敌曾清水师团长試行“和平談判”。十九軍派的是梁培璜，六十一軍派的是呂瑞英，（另一說這兩代表都是由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楊貞吉等冒名頂替的）他們到臨汾劉村，找到蘇體仁的代表蘇靜仁（偽山西省府第一科科長）后，轉介與清水師團長的山下參謀，談判的條件如下：

第一、晉綏軍改編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實行反共。日軍須將隰縣、午城、蒲縣、勃香鎮等據點撤退，將來並將汾陽一帶地區讓與晉綏軍駐紮。

第二、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剷除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

第三、日軍須接濟晉綏軍槍械彈藥。

第四、山西各將領之住宅、財產，日軍須完全交還。

這四條是日閻“臨汾會議”的重要內容。其中把晉綏軍改編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隊）”是閻錫山向日寇提出的，表面抗日，實則反共，深得日寇的諒解。事實上，不僅訂立了條件，而且已見諸實施，在解放區就曾經由被俘的十九軍軍官手里獲得這種“抗日忠勇先鋒隊”圖記。

日閻之間信使往還，謀求所謂合作

1939年12月，閻錫山為了掃清投降道路，發動了反共反新軍的“晉西事變”，亦稱“十二月政變”。“十二月政變”后，閻錫山的投降妥協活動便更加明目張膽了。

1940年初，太原日寇特務機關派奸奴白太仲（山西孝義白壁關人，原系閻錫山屬下一個區長，投敵后，閻委為二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兼平遙縣縣長，敵區工作團團長），偕同日寇囑

托（特务工作人員中的一種職名）小林高安，先到孝義兌九峪通過日偽“興亞黃軍”司令蔡雄飛的介紹，和駐隰縣大麥郊之閻軍警衛軍軍長傅存懷聯繫，接洽關於日閻兩軍“現地妥協，共同防共”的問題。不久，日寇又派憲兵特務頭子大矢親自到吉縣克難坡和閻錫山交換意見，確定“雙方在山西境內進入停戰狀態，彼此‘合作’，消滅山西境內的抗日力量——八路軍和決死隊……；並且實行‘物資交換’，互通有無……”。

同年3月間，大漢奸蘇體仁、梁上椿等人，日夜奔走於日閻之間，力圖促成日閻雙方的所謂“全面合作”。閻錫山為了進一步取得日寇的歡心，便將抗戰初期所俘的兩名日本兵，由其族孫閻立人秘密轉送太原日本軍部，以表示“合作誠意”。

4月間，日寇根據閻錫山迭次提出的要求，口頭答應：

- （1）將山西各將領在太原的住宅交還；
- （2）日軍在中條山發動戰事打勝後，閻錫山即可向太原前進。……

日寇先將雙池鎮據點讓給閻軍駐防

6月間，日閻雙方在太原秘密訂立了一項“軍事協定”。閻錫山派白太沖到隰縣馮家港向騎一軍軍長溫懷光作了如下之傳達：

- （1）日軍決定：為了和晉綏軍初步實施“合作剿共”之方針，即先將靈石境內之雙池鎮據點，交給晉綏軍駐防；
- （2）由騎一軍速派一部分兵力連夜出發，以“佯攻”的形式，占領雙池鎮。（對“佯攻”二字，閻錫山特別強調，其

目的是为了掩飾人民群众的耳目。)

温怀光接到閻錫山的指示后，即令其騎一师师长赵瑞率领騎三团向双池鎮急进，并向双池鎮外，朝天打枪打炮十数分鐘，旋得知日寇早已退去，才进入鎮內。后以騎一軍兵力不敷应用，遂将该鎮交由独二旅艾子謙部接防。

日寇向閻錫山提出“合作草案”

7月間，閻錫山令王靖国派其副官长刘宗康偕同十九軍六十八师副师长兼二战区长官部參議张仲孚前往太原，通过蔡雄飞(张与蔡原系东北同乡)的介紹，会見了日寇駐太原軍部的小林參謀和篠塚參謀长。篠塚首先对张仲孚說：“本人从前在包头时，即和王靖国將軍认识，现在很愿通过王靖国的关系，早日和晋綏軍达成友好協議，共同剿共……”随后提出一个“合作草案”——指定：“閻屬第七集团軍赵承綬部駐崞县、原平……一带；第八集团軍孙楚部駐临汾、运城……一带；第十三集团軍王靖国部駐阳录、娘子关……一带。閻錫山的长官部駐太原；如果閻本人愿到北平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員长职务，更为欢迎；太原长官部由楊爰源主持。日閻双方首先在軍事上密切配合，进行剿共……。”

这个“合作草案”由张仲孚带回克难坡，交閻錫山考虑答复。后来閻錫山感到全部投敌时机还未成熟：一来認為他的力量还不充实，如果公开投敌，必定遭受八路軍、决死队的攻击而无力应付；二来又覺得对他的“組、政、軍、經、教”所有干部做的“精神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在思想認識方面还不

統一，內部力量的控制也不牢靠……，如不經過一番“特別訓練”、“強力組織”與“無情紀律”等等措施，就難以都隨上他順順當當地去投敵。這是閻錫山所最耽心的事。因而他對日寇的“合作草案”的提議，不敢冒然答應。只是向日寇提出要求，請先幫助他充實力量，尤其是充實“剿共”的軍事力量後，再協商具體的“駐防問題”。

原來日寇的陰謀，只是第一步先把閻錫山誘到太原，把他的兵力分散到各處後，叫他當個“傀儡”罷了，因而對幫助他充實力量的問題，不感興趣，經閻錫山再三要求，也未肯明確答复。

正在這時，日寇由東京派兵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來到太原，授意駐太原的日本軍部說：“只要閻錫山肯投降，要什麼就答應給什麼，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條件……”。從此日閻之間互相勾結的談判，又繼續活躍起來。

白壁關會談與兌九峪和孝義城的“護渡”

11月間，閻錫山派趙承綬到孝義屬之白壁關，宣稱在白太沖家中“擺香堂”，發展“青幫”收徒弟，實際上系按照閻錫山指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四項原則，與日寇山西派遣軍（第一軍）參謀長楠山秀吉少將進行談判（蘇體仁、梁上椿列席）。當時他們都穿的是長袍馬褂，裝做大商人的模樣，以掩飾當地人民的耳目。他們彼此見面後，即行秘密會談。會上趙承綬代表閻錫山首先向日寇提出具體要求，主要內容是：“先給晉綬軍裝備三十個團，所需兵

員、武器、彈藥、糧食、服裝、經費等等，均請日方負責供給。”當時楠山秀吉即本田中隆吉的授意，予以答應，於是日閩雙方迅速達成初步協議。

日寇為了便於和閩錫山往來進行誘降活動計，又於12月間主動地將孝義縣西之兌九峪、胡家窰、高陽鎮、如來村等據點，讓給騎一軍接防，名之曰“讓渡”。當該軍接防上述據點時，閩錫山又指示溫懷光親率騎一、二兩師，仍以“佯攻”的方式，向天空發射槍炮，力圖表示用兵力“收復失地”，以掩飾和日寇勾結的罪惡事實。不料竟因此牽怒於當地日軍，認為閩軍這種動作，有傷“皇軍”威信，遲遲不肯按期“讓渡”。溫懷光慌了手脚，只得請白太沖向駐兌九峪的日軍部隊長再三道歉，一場小小風波，才告平息。

1941年3月，閩錫山又派趙承綬偕同溫懷光再到白壁關與日寇駐汾陽之若松旅團的高級參謀宮內中佐會商，達成如下的協議：

(1) 日閩雙方首先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是前綫部隊要彼此友好往來，不得發生衝突；

(2) 離（石）、軍（度）公路以北地區，對共之“防御進剿”，由日軍負責。離、軍公路以南，汾陽、孝義以西之地區，由閩軍負責。必要時，雙方可以實行“會剿”。

在協議之後，趙承綬又要求日軍將孝義縣城，讓給閩軍接防，作為雙方進一步“合作”的條件。當時宮內答以須向太原軍部請示後，再行答复。

同年6月，日寇通知閩錫山，願將孝義縣城，再行“讓渡”。但附帶聲明：這是為了雙方友好，日軍才答應將孝義城

“讓渡”給閩軍。因此，閩軍不得再沿用對雙池、兌九峪的佯攻故技，對外宣傳說將孝義城“攻下”，再次損傷“皇軍”的威望，如果這樣，“皇軍”必將斷然再將孝義城收回……。

當溫懷光率領騎一軍軍部和所屬騎二師（師長沈瑞）的部隊進駐孝義城後，日寇曾派了兩名便衣憲兵，進入該城，視察該軍有無“攻下孝義”之虛偽宣傳，溫懷光曾一再向該憲兵提出絕無此種宣傳的保證，並待以上賓之禮。

不久，趙承綬的七集團軍總司令部也搬入孝義城內。從此日閩之間，信使往還，更加頻繁。閩錫山投降妥協的罪惡活動，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閩錫山為達成投敵目的，對他的部下所作的“精神灌輸”

閩錫山為了欺騙他的部下，跟上他投敵叛國，于日寇“讓渡”孝義縣城的前後，大辦“暑期進步訓練”，又名為“洪爐訓練”，將他的所有大小文武官員，分批輪訓。在訓練中特別提出“存在是真理，需要是合法”的漢奸論調，並要求受訓人員一定要“言會長（民族革命同志會會長閩錫山）之言，行會長之行，志會長之志”。同時又提出“要跳黃河大家一起跳黃河”的集體投敵的無耻口號。

閩錫山還親自給受訓人員灌輸親日降日思想，他說：“目前以至將來世界的趨勢，一定要實行‘洲同盟’，如‘亞洲同盟’、‘歐洲同盟’、‘美洲同盟’……，而各洲又必須共同擁戴一個盟主來做領導。說到亞洲的盟主，舍日本而外，任何

国家都担任不起，中国和亚州其它国家一定都要推日本为盟主，才能不受英美等强国的欺侮，才能防止苏俄‘赤化’的危险……。”

同时，他还叫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赵戴文和其“高干”人员每天早 在“洪炉台”上对文武官员讲话，建立所谓“会长”的威信。赵戴文曾说：“中国的圣人，中国的文化继承者，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孙中山而外，再往下是谁呢？不用说就是我们的‘会长’！我们一定要同‘会长’一个鼻孔出气……。”他还作了个比喻说：“从前有个学者，路过华山，华山的门哗啦一声开了，从中走出一个白须老人，谓学者曰：‘华北有异人出世，西至嘉峪关，东至于海，北至大青山，南至于河（黄河），异人在此空间，大有作为，授尔天书三部，以扶异人，好自为之！’——这异人就是符坚，学者就是王猛。今日的异人（圣人）舍‘会长’其谁！”赵戴文把閻錫山比作符坚，把他自己比作王猛。并说：“我和‘会长’，君臣之分定矣！”赵戴文在讲话中所指的区域，正是閻錫山妄想在日本的羽翼下，做华北“儿皇帝”的区域。

閻錫山还授意他的“高干”们，到处为他吹嘘宣扬说：“会长一切都有办法，不久即担任华北的大任务。”又说：“会长是广开出路的，从来没有失败过，大家一齐跟上会长走，没有错……”

閻錫山还经常盛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用法西斯的办法，令他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加入他的特务核心组织——“铁军组织”（山三铁血团），并在红绸子上写着四句“箴言”：